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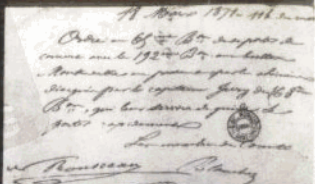
# 大首创的新世界

——献给巴黎公社革命一百二十周年



● 李景治 著

高放 审定



# 序言

##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重新认识 巴黎公社工人首创的新世界

高 放

1991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建立120周年纪念。华夏出版社廖国珍同志于1990年6月间约请我为纪念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节日撰写一本有时代感、有新特色的书，使之有益于广大青年和干部的学习。这样有见地的极好设想，理应大力支持。只因我任务繁重，病魔缠身，实在难以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我现在还身兼我校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研究所所长，有责任组织我们国际政治系的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于是我亟力举荐贤仲李景治同志来承担这项紧迫工作。他自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我校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学工作，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对巴黎公社的历史十分熟悉，最近教学有空挡，正年富力强，完全能够胜任。经过我们三人商议，确定这一本书，不是要写成简介巴黎公社的小册子，也不是要写成教材式的巴黎公社简史，更不是要写成深入探讨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学术专著，而是要立足我国现实，编写一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回顾巴黎公社历史实践、学习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中级通俗读物。主题和方向确定之后，我当即协助李景治同志草拟全书框架大纲，他经过不到3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写成这部20余万字的书稿。出版社请我审定并作序，我感到义不容辞，所以尽管工作极忙，还是只好遵命。在对这部书稿进行评介之前我

想先讲两个涉及本书主题的重要问题，这对读者了解、阅读本书会有好处。

## 一 巴黎工人首创的新世界是什么样子？

巴黎公社革命实践的最大、最高成就是什么呢？马克思对此作了异常明确的总结。他于1871年4—5月间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题为《法兰西内战》的著名宣言中指出：“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sup>①</sup>“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sup>②</sup>“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sup>③</sup>马克思还高度赞扬“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者，满怀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sup>④</sup>简而言之，巴黎公社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政权，要建设一个与资本主义旧社会对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要开创一个与资本主义旧世界对峙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这个新社会、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由于巴黎公社这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72天，当然不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创建一个完美的新社会、新世界。然而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巴黎的工人和人民群众确实在这弹指一挥间奇迹般地为人和后人首次开创了一个新社会、新世界的雏形，真犹如昙花一现，

---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5、377、378、385页。

大放异彩！尽管瞬息凋谢，然而其独特的芳华永世长存。

巴黎工人首创的新世界的新面貌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首次建立了工人民主共和国，创造出新的国体和政体。广大工人成为新社会、新世界的主人，由工人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实行工人民主、工人自治。由工人和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委员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实行议行合一，人民自己立法，自己执行，自己司法，自己监督，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一切权力统一于人民和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与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有本质的不同。工人民主共和国这种一切权力统一于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新体制，显然优越于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三权分立的旧体制，尽管三权分立制比之封建君主专制是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由工人和人民群众直接普遍选举产生各区代表，组成最高权力机关：巴黎公社委员会。公社委员就是国家高级领导人，中级领导人也是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任命，只有基层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才由上级任命和聘任。所有公职人员随时都可以罢免，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其工资最高不得超过熟练工人。最高工资为每年6000法郎，最低工资为每年1200法郎，相差只有5倍。选举罢免和保持低薪（第二帝国时期工人是低薪）这两条重大措施是使得工人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保持“社会公仆”本色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公职人员忠实地为“社会主人”工人和人民大众服务，才能够有效地避免“公仆”变为“主人”，即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这样就从根本上铲除了自有国家以来就出现的一个拥有高薪和特权的官僚阶层，使得工人的民主国家真正具有工人的特性，真正能够造就一代又一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这样才使得有史以来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恩格斯讲到国家性质的反复变化时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

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sup>①</sup> 这种情形在包括君主专制国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了上述“两个正确的办法”，这才使得它能够成为“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sup>③</sup>。

第三，在工人领导的革命政权中首次开创了独特的多派合作制，而不是一派垄断权力。以往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著作都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巴黎公社革命前夕，法国3个工人组织曾经筹备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党，然而工人政党尚未建成，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就导致革命的爆发。当时法国工人受“左”的色彩浓厚的布朗基主义和右的倾向明显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很大，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小。在被选举出来的公社委员中，布朗基派占多数，蒲鲁东派占少数，还有一小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新雅各宾派，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人士。总的说来，巴黎公社是实行一派相对为主（政治上布朗基派、经济上蒲鲁东派）的三派合作，并不是象资产阶级多党制那样互相拆台，我上你下。三派都没有建立正式的组织，都不是严格按照各派的主张行事，而是以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为重，在决策中民主协商、平等争论，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付诸实践。巴黎工人首创的这种一派为主、多派合作的政治体制，远比资本主义轮流执政或互相拆台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优越得多。

第四，巴黎公社不仅在政权机关中实行多派合作制，而且在社会生活中贯彻联盟政策。巴黎工人善于广泛争取、联合、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包括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子，甚至一些资

---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335页。

产阶级的人士。公社关于免交拖欠房租、无偿发还低档典押物品等法令都是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关于允许私商贩运出售粮食和肉类等措施也是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和爱国资本家的。刚刚夺取政权的巴黎工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并不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公社还尽力争取到中、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团体，如兵济会、中央共和主义联盟、各省共和主义联盟、各省协会联合会等不同程度的支持。公社在被围困的情况下，还想法用氢气球携带传单飘送出去，以争取外省农民的支持，尽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工人固然是开创新世界的先锋和主力，但是决不能孤军作战，而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尽量壮大革命队伍，分化、孤立、瓦解最反动的敌人。如果孤鸿哀鸣，尽管悲壮，必是绝唱；只有人多势众，齐心协力，才能地动山摇，改天换地。

第五，巴黎工人异常明确：在巴黎公社建立之后，紧接而来的目的就是“建立世界共和国”<sup>①</sup>，“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sup>②</sup>，所以他们在发扬爱国主义的同时，还非常重视高举国际主义旗帜，联合国际的革命力量和进步人士。首先是吸收流亡在巴黎的各国革命者参加公社的事业。匈牙利人弗兰克尔、波兰人巴比克、意大利人梅诺蒂·加里波第<sup>③</sup>曾经被选举为公社委员会委员。意大利民族英雄朱泽培·加里波第<sup>④</sup>、波兰人东布洛夫斯基、俄国人符卢勃列夫斯基还被推举任命为军事首领。巴黎公社能够选拔一批（而不只一个）外国人来执掌本国军政大权，这是具有何等博大的胸怀！还有众多的外国人，甚至组成侨民军团，为公社而流血献身。其次是拆毁象征民族沙文主义的旺多姆纪念柱。那是拿破仑一

---

①② 《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4、80页。

③④ 梅诺蒂·加里波第是朱泽培·加里波第的长子，缺席当选，因为他不在法国，未能参加公社的革命活动。其父于3月15日被推选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公社建立后曾派人去迎接他到任，他于3月28日致函辞谢。

世皇帝为显示自己盖世武功而修建的。再次是要求第一国际大力声援，“国际”确实尽力给予多种形式的支持。最后是呼吁欧美各国工人行动起来，英、德、奥匈、意、比、荷、瑞士、西班牙和美国的工人都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掀起了声援巴黎公社的群众运动。巴黎工人既然要开创新世界，就必须取得全世界工人和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

第六，巴黎工人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联合国内外革命力量，旨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世界。他们的最大成就就是奇迹般地使巴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依靠公社的各项革命措施以及它建立的各种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而得取的。公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革命法制，镇压反革命暴乱，惩治人民公敌，破获敌特活动，查封反动报刊，清除异己分子；同时禁止赌博，取缔卖淫，打击酗酒，清理陈尸。整个巴黎热气腾腾，社会秩序井然，甚至连偷盗几乎绝迹。公社还把逃亡业主遗弃的工厂移交工人管理，在卢浮军械修配厂首次试行工人管理制度，由公社代表、厂长、工长和工人选出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人有效行使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同时还废除面包工人夜班，禁止任意罚款和非法克扣职工工资；节省政府开支，建设廉价政府；稳定市场物价，保证居民供应；征用一切空房，缓交拖欠房租；禁止变卖当铺典当品，要求无偿发还低挡典当品；设立职业介绍所，以缓解失业矛盾；优抚军烈属。公社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发展群众性的俱乐部，发行革命报刊，改组剧院，恢复博物馆、画廊，举办画展和戏剧、音乐演出；实行政教分离，对劳动人民子女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兴办职业教育，提高教师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试办托儿所。尤其是十分重视言传身教，大力培养下一代革命接班人的工作。总之，巴黎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大有改善，精神面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七，激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保

卫革命果实。巴黎工人首创的新世界圣火当时面临被凡尔赛旧世界反动势力毁灭的危险。巴黎公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依靠全民武装，防备凡尔赛的反革命武装入侵；另一方面提高警惕，打击凡尔赛人的诱降和间谍活动。尤其是要求公职人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保持公仆本色，防止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袭。公社要求全体军民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誓死保卫革命果实，保卫工人首创的新世界，同旧世界的反动势力及其施展的硬的和软的两种反革命手法斗争到底。公社实行义务兵役制，加强人民武装队伍，实行宵禁，增强防务；所有公职人员生活清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为公社事务操劳，尽量节省开支，杜绝浪费，不要忘本，不讲排场，防止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严惩个别贪污盗窃和挪用公款的人员。连广大妇女和少年儿童都为保卫公社扮演了重要角色，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最后“五月流血周”中，众多公社委员、国民自卫军官兵和人民群众一起，为保卫工人首创的新世界而拼死决战，壮烈牺牲！

也许有人会问：当时巴黎工人才50多万人，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怎么能够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内首创出这样一个新世界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

第一，法国自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来经历了80多年时间，基本上已实现产业革命，造就出一代又一代产业无产阶级。工人们深受资本主义压迫剥削，他们本能地痛恨资本主义、向往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象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掌握着未来的阶级”<sup>①</sup>。法国工人身受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具有革命性、斗争性、组织性强的特点。早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就打完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263页。



锋，后来此伏彼起不断坚持斗争，而且多次掀起斗争高潮，在斗争中先后建立有同门会、兄弟会、救济会、生产协会、工会等组织，大多数工人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巴黎的工人约占全国工人六分之一。这样一个蕴藏着极大潜力的成为现代社会根基的工人阶级，在打破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转折关头，迸发出了冲天的创造力。这好比是铀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或极高温度的聚合下发生裂变或聚变，放射出了极大量的原子能。

第二，法国工人自1789年革命以来就开创了并且在逐步积聚自己的革命传统。法国早在中世纪就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出现过反对封建领主的城市自治的公社。1792—1794年巴黎等地工人和人民群众又建立作为社会基层自治组织的公社约4.4万多个。后来又经过1830年革命、1831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和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锻炼，革命传统和革命经验代代相传。思想上也经历了巴贝夫<sup>①</sup>、邦纳罗蒂<sup>②</sup>、圣西门<sup>③</sup>、傅立叶<sup>④</sup>、德萨米<sup>⑤</sup>、卡贝<sup>⑥</sup>、布朗基<sup>⑦</sup>等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熏陶。在法国，“社会主义”一词就是于1832年2月13日首次出现在圣西门派创办的《环球》杂志上；而“共产主义”一词(Communisme)就是源于法文“公社”(Commune)，实际上“共产主义”也可以译为

- 
- ①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者，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
  - ② 菲利浦·邦纳罗蒂(1761-1837)，意大利革命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卓越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 ③ 昂利·圣西门(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 ④ 沙尔·傅立叶(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 ⑤ 泰奥多尔·德萨米(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 ⑥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 ⑦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本书中有详细介绍。

“公有主义”、“公共主义”，它最早也是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巴黎、里昂等地工人的秘密革命团体中。从那时以来，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倾向愈益增强。这也促使巴黎工人有能力在革命斗争中首创一个新世界。

第三，法国自1789年革命胜利、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后，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其间君主专制制度有过4次复辟。1789年革命沿着上升线发展，它在推翻路易十六国王的封建王朝之后经过君主立宪制，到1792年人民第二次起义后成立法兰西共和国。1799年共和国第一执政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到1804年正式宣布建立法兰西帝国(后称第一帝国)，这是君主制的第一次复辟。1814年拿破仑战败，帝国覆灭，波旁王朝卷土重来，从1814—1830年是君主制的第二次复辟。1830年革命后至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王朝统治，可谓君主制的第三次复辟。1848年革命后重建法兰西共和国，史称第二共和国(1792年成立的共和国被称为第一共和国)。1851年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可谓君主制的第四次复辟。总之，法国自1789年以来，交织着民主与君主、共和与专制、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复辟的长期反复的较量与斗争。广大人民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可是实际上法兰西第一和第二共和国，加起来前后才有9年时间，大约有70年之久仍然是君主专制统治着人民，所不同的仅是封建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君主专制的微小差别。法国几代工人深受君主专制的种种压迫，饱经忧患与磨难，他们在1870年9月革命之后又一次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深感失望，所以奋力拼搏，在1871年3月18日革命的洪流中首创出工人民主共和制的新国家、新世界。

第四，法国工人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第一国际的重要影响。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马克思于1846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准备创建共产主义政党之时，在法国巴黎就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的

亲密战友恩格斯曾在巴黎进行传播共产主义和发动工人运动的活动。1847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巴黎就设有支部。1848年2月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德文版后，立即运往巴黎1000册，并且很快就有法译本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同年3月初马克思到达巴黎，接着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党中央主席，到4月初马克思才回德国参加革命。总之，在1848年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工人中最早播下了科学种子。在第二帝国统治18年期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时通过秘密途径在工人中流传。1862年法国工人代表到伦敦参加万国工业博览会，从此开始加强了法国工人的国际联系。1864年9月就是在英、法工人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5年初法国的巴黎等地就建立了第一个国际的支部。到1870年，法国已有50个国际支部，拥有会员约30—40万人。在国际内部，通过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多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到1871年2月，即巴黎公社革命前夕，国际巴黎联合会已协同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会联合会在准备建立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党。在3月26日选出的巴黎公社64名委员中国际会员有37名，接近一半。公社委员弗兰克尔、赛拉叶思想上接近马克思主义，公社期间又到伦敦直接向马克思请示。所以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sup>①</sup>，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公社是马克思主义的产儿。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第一国际对法国工人的影响，只凭以上三点内部条件，巴黎工人也无法取得首创新世界的成就。

巴黎工人在首创新世界方面固然取得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例如数量不够多，素质不够高，缺少马克思主义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因此还是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诸如没有及时进军捣毁凡尔赛反动巢穴，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没有夺取法兰西银行，没有建立起工农联盟，这些都是导致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公社首创的工人民主共和的新政治体制，也还有重大缺陷：缺少统一集中的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和军事领导，政权机关居然没有常设主席即政府首脑；还沿用革命前旧的选举法，广大妇女没有选举权；民主选举中也缺少统一集中的指导，致使个别异己分子和不适当人物当选为公社委员，有个别威信高的革命家又在不同选区重复当选。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巴黎公社存在以上这些错误和缺点而求全责备前人。巴黎工人既然是首次开创新世界，就难免有很多欠缺。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显示了新世界创造者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威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sup>①</sup> 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考察昨天比之前天增添了哪些新内容，然后再审视今天比之昨天创造了哪些新事物，以便从中掌握历史进步的轨迹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决不能以今非昔、以今贬昔，更不能以昔非今、以昔贬今，应该是从今鉴昔，使今胜昔。

## 二 怎样继往开来、在改革开放中认真学习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党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当前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究竟应该怎样学习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简要回顾一下我国人民以往认识巴黎公社历史实践的经过和吸取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成效。

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首创的新国家、新世界，在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反动阶级不可能对之有正确的认识。巴黎公社出现时，我国还处于封建社会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还处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残酷统治之下，1871年正是我国清朝同治十年。正好上一年6月发生了天津教案，即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丢弃大量死婴，法国领事出面镇压抗议群众，激起群众火烧望海楼法国教堂和领事馆，清政府竟屈服于法国政府压力，不仅赔偿巨款、杀民谢敌，而且派出以大臣崇厚为首的使团前往巴黎谢罪。崇厚及其随员张德彝等人到达巴黎时，正是3月18日起义前夕。3月18日起义胜利，国民自卫军掌权的巴黎工人政府没有让中国特使履行屈辱性的谢罪礼仪，这是法国工人政府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表现，也是法国工人政府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现。崇厚等人19日就离开巴黎回到波尔多，后又转向凡尔赛。直到5月28日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他们于6月11日又进入巴黎向梯也尔政府赔礼道歉。可见尽管巴黎公社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而中国封建专制政府还是紧跟梯也尔反动政府。张德彝在他的名为《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多处称巴黎公社革命者为“红头”、“叛勇”，作为封建王朝的官员，其敌视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政府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在书中对于巴黎公社还有一些较为客观的记述。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教会新报》在报导巴黎公社革命时称之为“乱党”、“贼党”、“贼兵”。改良派王韬于1871年写的《法国志略》和1873年出版的《普法战纪》中也称之为“乱党”、“乱匪”、“乱徒”，而且认为法国70多年来皆因“欲自立为民主国”，才导致“国乱无君”，巴黎“致乱之由，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足见他是维护君主专制、反对民主共和的。直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法兰西史》也还是称巴黎公社革命为“民乱蜂起”。

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兴起后，我国书刊中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就前进了一步。这时不再斥之为“乱党”等等，而对其革命暴动抱同情、支持的态度。覃斋(即宋教仁)在1906年6月发表于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称巴黎公社革命为“巴黎暴动Commune”；1907年6月在巴黎创刊的中文刊物《新世纪》创刊号发表《新世界的革命》一文，称颂巴黎公社革命为“公民之革命”，第一次把巴黎公社译为“巴里公民”。虽然译得不准确，但是承认它是公民组织。以前上海申报馆1879年出版的日本人冈本监辅撰《万国史记》一书把巴黎公社委员会译为“府会议”，把巴黎公社社员译为“府会员”。这还是按旧的封建行政体制，视之为州府机构。上海广智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日本人西川光次郎著《社会党》一书，把巴黎公社音译为“巴里哥妙”(第16页)和“巴里哥米阴”(第14页)。与这些相比，不能不说“巴里公民”这种不准确的译法已经前进了一步，反映出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认识有了进步。《新世纪之革命》一文还明确指出：“至法兰西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革除王位，宣布人权，乃为新世纪革命之纪元。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乃有平民社会革命，由于社会主义者鼓吹所致。虽其事未成，然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纪念，亦足以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sup>①</sup>可见，这已经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有了接近正确的认识，只是它还没有把唯一能够带头开创新世界的工人阶级同一般的平民区别开来。

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时才可能对巴黎公社的历史实践有正确的、真切的认识。首先反映在巴黎公社译名的变化上，同时也表现在对巴黎公社真象和经

<sup>①</sup>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76页。

验的评介上。1921年6月7日上海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第5号发表署名均(即早期从事工人运动的李启汉)的文章《劳农制度研究》,文中第一次简介了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名著《法兰西内战》的要点,这本高度评价巴黎工人首创精神的名著是在发表50年之后才简要地被介绍到中国来<sup>①</sup>,文中称巴黎公社为“巴黎的自治团”(第32);页第二年,即1922年12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刊物《少年》第5号发表伍豪(即周恩来)的《十月革命》一文,称巴黎公社为“巴里共治团”,第一次把它与俄国的十月革命相比较,认为“巴里共治团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了。”<sup>②</sup>又过一年,即1923年2月,李大钊应上海《申报》创刊50周年(《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之约,本来要写一篇《五十年来世界的劳工运动》的论文,后来因忙,他便一再缩小范围,选择与《申报》大体同时诞生的巴黎公社,写成《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这篇7000字的雄文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论述巴黎公社革命实践与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献。文章的副标题是《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这已经点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地位。文中概述了巴黎公社革命的背景、经过、特点、成就、失败原因和历史影响,指出:康妙恩“Commune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唯在巴黎,他是令人可以想起有1792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对于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专制的自治’意味的。然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sup>③</sup>“劳动者的共和国”,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巴黎公社的实质。李大

① 1921年3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刊登应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文中也摘译了《法兰西内战》的语录。

②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7页。

③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1页。

判文中虽然还把巴黎公社音译为巴黎康妙恩，但是我认为已较以前音译为巴里哥妙、巴里哥米阴进了一步。依我体会，康妙恩实含有音译和意译结合之妙，康妙恩者健康、美妙、广施恩泽之地也。然而这种音译词毕竟不利于普及和流传。倒是瞿秋白于1921年3月11日在莫斯科为他的见闻录《赤都心史》中专写了一节“公社”，其中提到“欧洲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要算1871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革命，马克思亲与其事。”<sup>①</sup>随即又谈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sup>②</sup>譬如莫斯科公社等等。瞿秋白大概是第一个人采用古汉语中早已有之的“公社”一词来把法文“康妙恩”Commune意译为中文。在我国古代，“公社”是祭祀天地鬼神的处所。《礼记·月令》<sup>③</sup>：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指日月星辰)，大割(即宰杀牲畜)祠于公社及门闾(即里门)。”公社原是古代公共祭祀之所，区别于私社。公社可以引伸为公共结社或公有社团，后人曾用以指原始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所以瞿秋白译为“巴黎公社”较之其他译名确实更好。随着《赤都心史》一书于1924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巴黎公社”的译名也就约定俗成，开始广泛流传，进而取代了早先各种各样的译名。

1926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在当时全国革命中心广州举行巴黎公社革命55周年纪念。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次纪念巴黎公社的盛大活动，而且成为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自觉地全面地在实践中学习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新起点。这次纪念活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单位共同发起筹备，《工人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作了大量报导。在3月18日纪念会上团中央书记张太雷作了《巴黎公社纪念日》的报告，强调巴黎公社短短的72天“已经证明工人执政比无论什么人

①② 《瞿秋白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页。

③ 顺便指出，《辞海》1989年修订本上册第732页，误为《史记·月令》。《史记》是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的史书，按本纪、世家、列传分类，何来“月令”篇？



都高明”，中央党部代表林祖涵（即林伯渠），全总代表刘少奇、邓中夏等都出席大会。大会筹备处还编辑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手册》，收入了包括张太雷讲话在内的11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正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在同一天举行的另一个集会上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其记录稿要点曾发表在同年3月31日出版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2期上。这份珍贵文献近几年才发现，已刊登在《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9期。毛泽东指明：“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底政治的经济的革命”，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他特别强调巴黎公社失败的两个原因：第一，“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第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sup>①</sup>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是深切记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以之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从此以后，我国工人和革命人民几乎年年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纪念巴黎公社革命；在纪念中总是联系当时我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努力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927年12月广州工农兵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可惜只存在了三天就失败了。由于它与巴黎公社的命运相似，1928年以

<sup>①</sup>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9期，第4-5页。